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中国之行

五十年回忆录

第 四 部 分

(美) 费 正 清 著

赵 复 三 译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中国之行

五十年回忆录

第四部分

(美)费正清 著

赵复三 译

中华书局

1983年7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仅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人员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1980年1月修订

译者说明

一、本译稿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五十年回忆录《与中国紧密相联》(纽约哈泼与罗出版公司, 1982年初版)一书第四部分。内容是作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参加美国政府工作, 被派到中国, 在重庆、昆明、上海等地接触当时国民党政府要员及学术界、文化界的回忆。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社会情况,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得人心和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作者本身虽有其局限性, 但记录所见所闻, 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二、由于译者水平所限, 本译稿中误译或不确之处在所难免, 谨请读者不吝指正。

三、本译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辑出版。

目 录

15、迁入华盛顿.....	(1)
16、战争中前往中国.....	(12)
17、在重庆安顿下来.....	(25)
18、玛丽·梅乐士与战略服务局.....	(37)
19、学术中心与美国的利益.....	(44)
20、1943年——蒋介石开始失去民心.....	(59)
21、发现了左派.....	(79)
22、回华盛顿战时情报局工作.....	(98)
23、战后中国.....	(108)

迁入华盛顿

珍珠港事件前四个月，我被美国政府征召参加为战争服务的学术机构。此后五年我暂时离开哈佛。首先在华盛顿度过一年（1941年8月—1942年8月），然后，在中国度过一年另三个月（1942年9月—1943年12月），在华盛顿住了一年另八个月（1944年1月—1945年8月），最后又在中国度过九个月（1945年9月—1946年7月）。我34岁到39岁时的这段风险经历把我带入了世界性事务中去，并无疑地改变了我。正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战争年代的经历使我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思想与如何采取行动。这是由于战争提出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新课题，要求我们具有创造性的行动。

1941年夏，比尔·杜诺万上校作为新成立的情报协调局长，正致力于建立全球范围的情报和特工组织。情报协调局下属的研究分析处是用以支持其他部门的一个独立组织。它的指导思想是：对各种事实进行分析，才能弄清情况；这对将采取的各种行动是否正确，关系重大。研究分析处的人员主要来自各大学。对他们的要求是：要像他们以往在学术界那样，以严格的学者态度研究问题的现状及将来。

威廉斯学院院长詹姆士·芬尼·巴克斯特三世被聘为研究分析处主任。巴克斯特约请兰格参加，兰格又推荐麦凯，麦凯又推荐了我。于是，我们四人于1941年8月离开历史系前往华盛顿。8月13日早晨9时15分，在宾州大街与宪法大街路口的空荡荡的鼎盛大厦中，巴克斯特、兰格、麦凯以及兰格的得意门生，俄国问题专家菲利普·莫斯利举行首次会议，商讨研究分析处如何建立。为使学者的工作能在军事问题上发生作用，他们需要陆海军人员与情报协调局人员合作。当时，国会图书馆新楼正好落成，情报协调局研究人员就在国会图书馆新楼中着手工作，但是，国会图书馆各研究组的研究报告都直接提供情报协调局总部（它座落在华盛顿市区的另一端25号街与西北E街路口）。SI（秘密

情报部)和SO(特工部)也座落在那里。

巴克斯特和兰格从全国学术界物色各种专家。他们招聘到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多年担任密歇根大学政治系主任的约瑟夫·拉尔斯顿·海顿教授。他是一位远东问题专家,曾在菲律宾大学任教,并于1933—1935年担任菲律宾副总督。1941年他的大作《菲律宾:国家发展的研究》刚问世。与此同时,唐·麦凯负责把国务院每天收到的无数电报摘要提供给研究分析处,以便研究分析处能够分享各种情报——正如神怪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缝制没有生命的人像,需要通过电流以使人像得到生命。

当时我还很年轻,只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大学不过是个讲师,但是,我主张使用中国和日本的材料来研究中国和日本,并成为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叫我去啃的第一块骨头是海军方面提供的日本造船与铝、钢和飞机制造的情报。这是我在前一天访问海军情报局得知的一份重要情报,杜诺万上校要求对它作出鉴定。于是我花费了一个下午。这份情报是由伪装成渔民、香客的间谍进行观测而拼凑成的,此外还有不知来源的统计和有关新机场和工厂的各种名单(后来获悉它是英国方面的情报)。情报中提到日本工程师正在“勘测由下关到朝鲜釜山之间的海底隧道,那不过是横跨对马海峡,相距122英里。”

我认为这份报告不准确,从日本报刊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巴克斯特和我向杜诺万上校提出我们的看法。杜诺万给我的印象是“平稳而优柔寡断,办事举棋不定”。他的确办事举棋不定,但另一方面,那正表现出他力求使工作具有创造性。至于优柔寡断嘛,他决不是那种人。

此后不久,我就同时要着手两三方面的工作——帮助国会图书馆建立远东组,其中包括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帮助杜诺万上校在政府各机构中间证明:新建的情报协调局网罗有专门知识的学者,是十分有价值的,并且要结识在华盛顿的所有“中国通”们。当时,每一个政府机构都骤然间感到需要谙悉中国情况的人员。我们在北京或中国各地四年期间结识的那批朋友,很快就像菜肴上的辣油那样浇遍全城,而且每周都有更多的老中国通到来。

我们夫妇在我的同学比尔·杨曼夫妇家中下榻历时几周。杨曼的夫人艾尔西·珀金斯曾一度在我们北京的家中借住,他们夫妇最初相识也是在我们家中。

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比尔是联邦能源委员会的首席顾问。这时，他与汤姆·考克林合伙经营法律事务所。他们参与宋子文建立的“中国防务供应公司”。艾尔西的先辈曾经从事美国早年对华贸易，现在，她的丈夫又从事一种新型的对华贸易。这个公司一直继续到战争结束以后。最后，宋子文聘请比尔担任他的房地产经营代理人。

威尔玛只用了几天功夫就找到一处舒适方便的房屋，它座落在乔治城区三十四号大街（西南段）一三〇六号，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厨房、两间卧室和一个小花园。我们立即签订了合同，准备从9月1日迁进新居。

8月14日，我去看望劳合林·柯里。1928年，劳合林还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讲师、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经过拉福莱夫人——伊萨贝拉的介绍，在麦迪逊与拉福莱的连襟，柯里夫妇会过面。柯里一度在联邦储备局工作，后来成为罗斯福的六名行政助理之一，1941年初被罗斯福派往中国去见蒋介石，并被任命主持租借法案和对中国的活动。

柯里博士是白宫工作班子的一员，他的办公室在国务院大厦（现在的行政办公大厦）二楼，正在国务院远东司办公室下面，房间很大，有两个秘书。当时，他正为滇缅公路的种种问题大伤脑筋，为此把纽约的一些卡车运输公司经理们派去组织运输工作。这条公路是中国取得供应的主要血管，然而它却腐败透顶。那些司机，连为机件加油都不会，却知道怎样贩运私货。派去的纽约佬通常不是好对付的，但是，在一个串通抵制他们的环境里，却是束手无策。

在劳合那里，我发现他实际是克莱尔·陈纳德上校的后台。当时，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空军团（一支非官方的雇佣空军）配备有一百架P-40型歼击机，正在缅甸秘密训练之中。后来，情报协调局研究“对华援助”这个题目时，我为他们安排利用劳合的档案，以说明对华援助的初期情况。

劳合的经费预算中没有款项聘请助手。经过几个月周折，最后到十二月里，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我以情报协调局委派名义，用部分时间协助劳合工作。这样做一举四得，对劳合，对我，对情报协调局对战争都有好处。因此，圣诞节时，我就在劳合办公室旁边224号房间开始办公，电话号码是“白宫80号”，还能有比这更体面的身份象征吗？

就这样，我在权力大厦的走廊里逐步上升，其实当时我的工作很清闲，无非是到处串门，与人谈话，从中收集情报，解决一些次要问题。这项工作很有趣，使我在战争即将爆发的一九四一年秋季，对那些正在制订对华政策的戏剧性人物，有一个观察的机会。

继柯里之后的演员表上，领衔的是斯坦利·库·荷恩贝克。他和我，从外表看来，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来自中西部，在威斯康辛大学时都参加同一个联谊会，还属于其中同一个支部，我们又都接受过罗氏奖学金，在哈佛又是历史系前后同事，他讲授“1793年以后的远东”一课，以后由我接任。有时，我甚至担心，我们两人连脾性都一样。

8月15日，我打电话给荷恩贝克博士，告诉他，我到华盛顿工作了。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粗暴生硬，问我，杜诺万打算干什么？

他对自己的任务是怎样理解的？他为什么把这么多人搞到华盛顿来？

我表示不知道，这也是事实。我又说，我以为他是一切都了若指掌

的。当然，我只是作为老相识，和他在电话里作非正式谈话，我以为

这并无不妥之处，因为我还没有被派到哪个部门、哪一个人手下，我

希望得到他的意见。

几天以后，威尔玛和我去看望他，只是喝了点应酬酒，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显然，他认为对华政策问题，只要有他就够了，至于柯里，无非是办点具体事情。

斯坦利的书房，头顶上有各种绳竿，写字台是可以开合的新鲜玩意儿。这一切都被组合在一起，适宜于动作缓慢的人，土里土气，正像他本人一样。

如果从某个人的事业可以概括美国远东政策的弱点，则应属斯坦利·荷恩贝克了。他在中国的生涯是从1909—1913年（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官办学院里任教四年，这正是他获得罗氏奖金（1904—1907年）之后，那边对他在语言上并没有要求。他的学术专业是政治学。当时政治学刚从历史学分离出来，但仍与法学有密切关系。1911年他在威斯康辛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是保罗·芮恩施教授，芮恩施后来成为威尔逊派驻中国的公使。荷恩贝克于1916年发表《现代远东政治》一书，1914—1917年间，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第一次世

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位陆军上尉，由于在1919年凡尔赛和谈中充当了远东问题专家而一跃成名，接着又在1921年参加华盛顿会议。以后他在政府中担任专家。1924年至1928年，转入哈佛大学讲授远东历史。1927年发表了《今日中国》一书。1928年又回华盛顿担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他擅长于把法律义务和道德原则搅拌在一起，这完全适合美国一贯夸耀的开放政策。这种陈腐而软弱的外交理论，在当时却很合荷恩贝克的口味。这样可以既站在美国立场维护法律形式，又站在中国立场玩弄正义的词句，两方面他都可算作相应的美国文化的代表人物。

他在国务院生涯中最奇特的方面是：他并不是职业外交官，只是个民间专家，而1937年以后却在国务院远东司主管中国和日本科，凡涉及这两国的事务，均需由他过目，并得到他的批准。这种不寻常的安排表明，远东和其他地区不同，这种工作对门外汉来说简直捉摸不透，需要由“懂得”东方的专家来掌握。

这幅图画，问题不少。然而，荷恩贝克博士精力充沛，十分自信，也很精明。他也和其他的中国通一样——自封或被认为具有凡人所无的奥秘知识。他到过中国，也讲授过中国现代史，但是这并未曾使他认识到自己（以及每一个人）多么缺少知识，相反，这一点十分有限的知识却给他带来了成功的经验，并给予他十足的自信心。他只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到过中国，而中国发生过好几次革命，他都不在场，因此，那些革命都在他的视野之外，但这对他毫无妨碍。他的主要特性就是一种惊人的自以为是。在我们早期的接触中，有一次他曾向我解释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像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轨道早已铺好，目标十分明确，日本人应该懂得这一切，这就全看他们了。”这样，两辆火车要避免迎头相撞，就要看扳道叉的功夫如何了。

1941年8月，曾经在日本和中国服务的外交官们起来反对国务院远东司对日本采取的明显的绥靖政策。当时，国务院远东司的司长是麦克斯·汉密尔顿，他是个毫无见识的人，只知道对他的上司荷恩贝克亦步亦趋。有几名外交官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像副国务卿苏姆纳·威尔斯一样，要求对政策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但远东司内的这次分歧被敷衍过去。1944年，远东司的官员们又一次对荷恩贝克造反，指责他对赫尔国务卿封锁重要情报。不久以后，荷恩贝克被派到

荷兰去担任大使，他的官运就此完结。

斯坦利·荷恩贝克认为“决策者不需要对实地情况有直接接触，因为一切情报都会送到国务院，经过他的办公桌，唯有这时，一个人才能看到全貌。这是他把自己的弱点说成自己的优点的办法。荷恩贝克的聪明年轻的助手阿尔格·希斯，为这种有害的思想当吹鼓手。我以前不认识他，他远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和我熟悉的人，都认为他对荷恩贝克拘守条文的保守思想，太驯顺了。他对远东一无所知，唯一拿手的是程序和礼宾事宜。

在国务院管界内，最优秀的人物首推约翰·佩顿·戴维斯。他是在四川出生，离开北京后，曾到沈阳旅行一圈，这时已回到国务院。他在接电话时常常以清脆的声音用日语说：“莫希，莫希”（喂，喂），使打电话的人以为东京接管了这家电话，戴维斯却以此为乐。

在五角大楼，迪安·腊斯克当时已经是陆军上尉，正负责军事情报中有关大英帝国部分。他的前任是一位和霭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连一个保管剪报档案的助手都没有。我们对在印度和缅甸展开军事行动并未作好准备。情报协调局在这方面的贡献之一，是搜集地图和由专家计算出来的印度铁路运输能力。

当时，在五角大楼担任中国谍报工作的G—2官员是一位漂亮动人的少校弗兰克·罗伯兹。他曾在北京担任语言教官，当时我们参加同一个学习小组。1937年，他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舰潘奈号上任指挥官，这艘炮舰被日本飞机炸沉，差一点把这位指挥官炸死，罗伯兹从此成为英雄。我作为情报协调官员，向他提供国民党政府基本情况的档案，这是1941年2月柯里博士在重庆所得到的。这些表格看上去洋洋洒洒，却并不准确；但这是我们仅有的这方面资料。我把这份资料复制提供给G—2，并且把弗兰克和劳合约到一起吃午饭。他们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作非正式会面，要比经过官方的途径容易得多。

8月17日星期日，我们到胡适大使那座被草地树丛包围着的堂皇住所，和他共进午餐。他曾经在二十年之前领导过五四运动中的一翼。他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

8月18日，我又遇到另一位北京的老朋友和学中文的同学海顿·博特纳少校，他正从事向中国提供军需的工作。他要应付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们只要

最新的東西——例如，橋梁無法通行的重型坦克——而他則強調有爆破力的武器，這更為有用，也容易得到。海頓真正做到學以致用，按照他所受的訓練，由美國幫助中國增強軍事力量。

次日，我拜訪了宋子文。杜諾萬曾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與宋子文和宋的顧問，曾在國聯擔任衛生專家派駐南京的路德維希·拉奇曼博士會見。

T.V.（子文的英文縮寫）和我一起回憶威斯康辛大學足球隊的中衛道爾·哈門，帶球多么快，在對方後衛之間穿插自如，直到把球帶到底線。R（拉奇曼）身材矮小，目光銳利、鷹鉤鼻子，像白鼬似的到處窺探。他們兩人都像要把我刺透似地盯着我，我也同樣使勁盯着看他們。

杜諾萬向他們解釋，說我是他的遠東問題專家。後來，他把宋子文的信拿給我，其中強烈要求美國援助飛機，以便抵禦日本對重慶的空襲。……認為我們只顧援助俄國，而對中國僅說一些空話。

幾個月內，美國志願空軍團，也就是飛虎隊，便將能保護重慶。但是，在1941年夏末，宋還在為中國的戰時首都極力爭取空防力量。杜諾萬是他活動的渠道之一。但是，當時杜諾萬還忙於在華盛頓這座發電廠里，把他自己那部發電機安裝起來。由於我當時闖了進去，我被臨時說成是他的“專家”。其實，我於重慶的空防，沒有任何用處。杜諾萬在這一點上的權力，也並不比我大。事後，我在日記中寫着：“宋的呼喚信，除我之外，不知還有誰讀它。”（當然，我說錯了。）*

當時，我就是這樣，與許多人會晤，卻沒有做多少事情。九月里，我聘請波莫那學院的伯頓·法斯到我們的研究分析處主持日本方面工作。約瑟·海頓則充當高級分析家班子中的一員。伯頓和我都沒有指導這種研究的經驗，因此，我們接受了海頓的建議，聘請密歇根大學的查爾士·雷默教授來擔任我們的遠東組長。雷默曾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任教，他的關於外國在華投資的著作，成為這方面的權威著作。他又帶來了與他長期合作的一位研究助理。於是，我們就

• R.E. 謝伍德的《羅斯福與霍浦金斯》一書第406——408頁提到宋的這個呼喚。

在国会图书馆的新建附属大楼中，把各组工作建立起来，用雷默的话说，“开步走”了。当时伯顿和我都还资历很浅，雷默作为领导人，理解力又太迟钝，但为人心地很好。当时，我们最操心的是要和华盛顿的各政府机关竞争，物色干才。

我第一次参加“情报即权力”的游戏是：杜诺万给我们一个紧急通知，要准备一项关于中国铀矿资源的备忘录。幸而我们手边有新版《中国年鉴》，从书末索引中查到“铀”字，再翻阅正文，提到湖南、江西有铀矿。我们的绘图员赶制一幅地图，在湖南、江西标上三个“×”形记号。我就拿着这份临时炮制的盘菜，匆忙送给杜诺万。当时他正与汤玛斯·K·芬莱特在开会。这可以算是我对“曼哈顿计划”*的贡献。

在国会图书馆附属大厦中，一时还没有很多工作，于是，我征得雷默同意，设法与其它政府部门建立联系。本来，情报协调局的任务就是进行协调。我把分布在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一些新建立，还不为人所知的机构如经济作战局等处的过去在北京结识的朋友以及别人组织起来，每星期三利用中午聚餐，举行非正式聚会。这就把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们都联络组织起来了。

在华盛顿的一件快事是我得以与毛蒂默·格雷夫斯和他的夫人琴恩熟悉起来。他以一贯的远见，早已编制了熟悉东亚语言的美国人名录，以备战争来临的不时之需。他又雇威尔玛编制一本关心中国的美国各团体名录（1941年出版）。

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曾有一度不录用妇女，这是因为它的会长华尔多·莱兰鉴于他的前任曾经雇用一位女秘书，这位女秘书把一切档案都记在自己头脑里，以致离开了她就像计算机停了电便无法运算一样。威尔玛到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任职，只能在人们看不见的一间后屋里工作。

毛蒂默喜欢凡事自己动手，对秘书协助工作没有多大兴趣，是个孤独的领导人。他以丰富的想像力推动美国人学习各种冷僻的语言，特别提倡对俄国和中国的研究，靠他的坚韧性和独创性，以微薄的力量，支持一些重点大学聘用年轻的

* 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制造原子弹计划的代称。

讲师，出版译著丛书和丛刊，举办暑假学校，帮助图书馆和培训人材等，前面提到过恒安石* 从事的编纂中国人名大辞典的工作，不过是一项成就之一。

毛蒂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飞行员，后来成为一位历史学者和人文学者。他有许多癖好，其中之一是精细木工。他预见到在一个交往日增的世界中，对各种语言和后来所称的地区研究专家，将有越来越大的需要。最初，他曾被聘担任我们研究分析主任。但是，他不愿到政府部门工作，认为那将扼杀他的主动性和手艺人一般的精细工作精神。

1941年12月8日是星期一。那一天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电话声不断，都是要物色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专家，最好是男性，年龄在二十一岁到三十岁之间，对两国实地工作经验，能操流利的当地语言。如果有这样的干才，早已被海军方面捷足先登抢去了。海军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遍访全国，罗致研究这两个国家的专门人才。

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当时只致力于对拉丁美洲开展睦邻关系，所以直到1941年后期，作为国务院工作建设的一部分，才被授权成立中国处。主持人是一个有经验的中国问题官员威里斯·R·佩克。威尔玛是他手下第一个雇员。佩克着手教导威尔玛如何做到官僚机构所要求的精确程度和办事手续上面面俱到，这对一个刚征募来的官员是重要的一课。威尔玛此后在政府机构中工作了五年，最后成为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文化官员。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下午，当听到电台广播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时，我如同其他人一样，急忙赶到办公室坚守岗位。可是，在空荡荡、鸦雀无声的国会图书馆附属大厦里，我找不到收音机。于是，只好向家里打电话，从威尔玛那里，了解事态进展情况。当时，马歇尔将军还在岩石小径公园骑马。不过，他到了办公室里，至少可以收听到消息。

战争好像证明了所有我们的备战措施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从哈佛来到华盛顿，从一个人独立工作的环境转向集体工作环境时，我一直有一种感

* Arthur Hummel, 现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父亲，原为美国在华传教士，回国后在国会图书馆创建中文藏书部，以此著名——译注。

觉，这是从一项事业转而从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这种感觉并未由于战争爆发而消失。过去的学术生涯使我感到每天都在完成一些事，例如，有目的地阅读了一本书，一堂堂扎扎实实的讲课像是为大厦增添一块砖石，与学生的一席谈话，帮助了他的成长等，我可以从中看到成果。可是，华盛顿的官僚生活使一个人被无数的电话、会议、公文、同事会见共餐、社交活动等所包围。而且这种经常性的来往，充满了竞争和低劣的政治手腕。一项政策倡议是否得到重视，往往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而要看兜售的本领如何；纵或所处理的事情关系重大，但很难说个人取得什么成就。

虽然官员生活对我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但是作为情报协调局和柯里的联络员，我认为自己做得相当出色和成功。我的任务是了解在各种政府机构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每个人情况。同时，我协助散发重要消息。情报协调局设有很强的制图部门和精干的制图员。我们出版公路、火车、河运交通的地形图，这些可以收到立杆见影的实际效益。我们还出版名为《中国战况》的周刊。我还从事美国援华历史的研究。最后，我利用柯里的大办公室作为会议室，不定期地把一些主要机构中的中国专家召集在一起，交流工作情况并互相启发。

情报协调局的研究分析处要为陆军和海军军官手册编写其中经济、社会和政治部分。这些工作要根据G—2和海军情报局的资料，加以扩充，把数据、地图、概况汇成简编，以供指挥官随时应用。这些工作策励着新机构的工作人员。从同一批专家那里，我可以找到有用的材料，为劳合*草拟备忘录，送给罗斯福。有一时期，我成为他的印度交通专家。我所依赖的是打电话问不列颠帝国组的丹·桑纳。当劳合问我印度有多少卡车时，我在五分钟后回答了他，使他大为惊讶。

我的来往穿梭，不过是在一些人之间做穿针引线的介绍人。我没有强烈的政策信念，因为我对当代中国没有任何直接了解。劳合林·柯里被罗斯福派遣，再度去重庆（1942年7月21日—8月7日）回来后，要求全力支持蒋介石，认

* 劳合林的名字缩称——译注。

为对蒋介石不需要采取什么牵制手段，可以信赖他“会顺着我们的心意，执行一项强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制度的强大国家*”。显然，劳合对中国也没有第一手的了解。

到1942年6月，研究分析处的远东组已配备了二十名官员和七名兼职的咨询人员。其中有八个人从事对华工作。他们平均有七年在中国的经验。远东组前后提交了七十五篇报告或研究论文。然而很少人涉及到政策。我们只负责汇集事实，与政策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至于政策方针需由柯里那样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去考虑。

1942年1月，新加坡沦陷后，日本向缅甸挺进。派史迪威尔到中国执行任务已在进行之中。这时，华盛顿的每个机构都感到需要在重庆设置派出机构。

* 迈克尔·夏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1979年出版，第235页。

战争中前往中国

战争的风云变幻，会给顽强的事业家带来千变万化的机会。为应付前所未有的局面，必须想出各种新办法，其中，有些是办到了，有些则没有。当时没有人对我的工作职责给过什么明确指示，全靠我自己去做。我给自己规定的角色是根据事物逻辑综合的结果，形成一条首尾一致的行动路线，我便沿着这条路线干下去。

工作开展使研究分析处远东组需要在中国派驻代表取得研究资料。我和法斯的第一个建议是采取大卫·奈尔逊·罗威分析中国报纸的办法。当时，卡尔·莱墨还没有担任我们的领导。大卫在哈罗尔德·拉斯威尔以及其他政治学家的熏陶下，对计量分析简直是上了瘾（计算各种政治字眼出现的次数）。他把信口开河的政治讨论，进行计量分析，变成以数字为基础的科学。他已从基金会方面取得了资助，前往重庆从事这项研究。我们委派他代表研究分析处在那里工作。他于1941年11月27日抵重庆。

情报协调局在中国开展工作不是一个小问题。操华语的美国人征募中国职员时，需考虑到他们可能是双重身份，还要向中国老板汇报情况。

任何秘密，就像垃圾箱里的空罐头招来苍蝇一样，并且不时制造各种夸大性谣言、错误观念、恐惧、虚幻的希望和嫉忌等。当时已五十四岁的约·海顿应算是有经验，有头脑的高级政治家，他推荐在中国盐务局工作的艾逊·麦克多威尔·盖尔博士充任情报协调局在中国的代表。

我曾上海见过盖尔博士，他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中国通，略带圆脸，留一小撮英国式胡须，曾在荷兰莱顿大学获中国学博士*，是美国的一位学者官员。

* 盖尔博士的论文题目是《盐铁论：论古代中国关于国家控制工商业的一次辩论》，于1931年出版。《盐铁论》第1——19章记载了公元前81年的一次辩论。1934年盖尔博士翻译了《盐铁论》第20——28章，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上海出版。